

政·府 企·业

ZHENG FU QI YE

个人经济行为研究

徐向艺 张敦胜 钟耕深 陈志军 著

ZHENG FU QI YE

中国经济出版社



中财 B0005806

政府·企业·个人 经济行为研究

徐向艺 张敦胜 著
钟耕深 陈志军

1091/24

中央财经大学图书馆藏书章

总号 418648

F27/615

中国经济出版社

(京)新登字 079 号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国内首次相互联系地研究政府、企业、个人三大主体经济行为机制的学术性专著。作者全面分析了三大主体的经济行为机制与经济秩序、资源配置和经济变量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每个经济主体行为机制的内部，进行了多层面的理论分析，阐述了不同经济制度下各个经济主体的行为模式及其对经济秩序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探讨了各个主体行为机制优化的途径。本书还将三大主体的行为机制置于一个统一的大系统，仔细分析了它们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内在机理，以及如何通过完善法律与法规、制度与契约、舆论与道德，实现当代中国经济秩序的创新。

本书可供经济理论工作者参考，也可供高校师生和工商界人士阅读。

责任编辑：刘一玲

封面设计：王 滨

政府·企业·个人经济行为研究

徐向艺 张敦胜
钟耕深 陈志军 著

*

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百万庄北街 3 号)

(邮政编码:100037)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星海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 6.75 印张 168 千字

1993 年 9 月第 1 版 199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ISBN 7—5017—2383—4/F·1636

定价: 5.40 元

前 言

本书最初酝酿于 1987 年。当时，企业行为是经济理论界的一个热点，并且已经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现在看来，理论研究的每一个热点，都有其现实的背景。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不久就遇到了一个难解的结：企业行为是扭曲的，仅仅下放权力并不能产生高效率的经济秩序。于是，人们试图从企业行为入手，设计和创新经济秩序，解决中国经济中诸如效益低下、秩序混乱、不公平竞争等难题。但是，很快我们就发现，企业行为问题与其它许多问题纠缠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致使企业行为的合理化仅仅停留在人们的良好愿望上；特别是政府行为对企业行为的决定性影响，在中国体制转轨过程中表现得比在西方国家要突出得多，这促使我们把关心的重点转向了政府行为。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我们又发现，政府行为的合理化同样不能解决中国经济运行中的全部问题，尤其是个人行为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与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问题也是纠缠在一起的。于是，我们又对个人行为进行了专题研究。

显然，我们进行的专题研究，是在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展开的背景下进行的倾向于“对策性”的研究。正是在这种研究中我们感到了相互联系地研究各种经济主体行为的必要，感到了从理论的高度上（而不仅仅是对策性的）研究经济主体行为机制的必要。我们还发现，理论界几乎还没有涉足这样的研究角度。于是，从 1990 年起我们开始对政府、企业、个人三大主体经济行为及其联结、耦合机制进行系统的讨论和写作。

在酝酿和讨论书稿的提纲时，我们考虑，首先应当深入每个经济主体行为机制的不同层面，从浩如烟海的经济学著作中汲取营养，进行理论的探索和创新，因为现实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不仅需要对策性的理论和政策主张，而且需要基础理论的指导。

于是，对政府、企业、个人行为分别进行研究，构成了本书的主体部分，即第二、第三和第四章。其次，应当站在更高的高度上，将现代经济活动中三大主体的行为机制置于一个统一的视角，进行理论上的探索和对策性研究。如果不从三大主体内部“跳出来”进行统一的考察和分析，哪一个主体的问题也解决得不会彻底，就更不用说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问题了。所以，我们安排了第一章和第五章。

理论专著不同于教科书。本书的著述是我们多年从事这方面研究的结果，不少观点已发表在《文史哲》、《经济管理》、《经济体制改革》等刊物上。这也是我们能在党的十四大召开以后较快完成本书稿的原因。由于是理论探索，书中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不当之处，还请读者诸君不吝赐教。

本书是集体研究的成果。在徐向艺提出大纲的基础上，执笔分工如下：第一章(钟耕深)、第二章(钟耕深)、第三章(陈志军)、第四章(徐向艺)、第五章(徐向艺、张敦胜)，最后由徐向艺统纂、定稿。

本书在成稿过程中，我们参考了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的论著，在此谨表谢忱！中国经济出版社从社会效益的角度出版此书，这给我们继续从事科学研究以极大的鼓舞。这是我们更应该感谢的。

作 者

1993年3月2日于济南

目 录

前 言	(1)
-----	-------

1.

经济主体与经济运行

1.1 有关行为主体：一个永恒的话题	(1)
1.2 三大主体：经济运行机制的“能动装置”	(9)
1.3 单一主体与三元主体	(15)
1.4 另一视角：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前瞻	(23)

2.

政府经济行为与管理体制

2.1 市场失效呼唤政府行为	(27)
2.2 不同经济理论中关于政府行为的假定	(40)
2.3 进一步比较：两种经济体制下的政府干预行为	(54)
2.4 我国双重体制下的政府行为	(58)
2.5 目标模式下政府经济行为机制的优化	(66)

3.

企业行为与企业制度

3.1 企业制度的历史考察	(76)
3.2 企业行为的一般规定	(80)
3.3 国家统制企业制度与企业行为	(84)
3.4 双轨制条件下的企业制度与企业行为	(91)
3.5 他山之石：西方国家的经验	(97)
3.6 困惑与希望：中国的道路	(105)
3.7 企业制度创新	(116)
3.8 股份公司制度：历史性选择	(120)

4.

个人经济行为及其导向

- 4.1 一个不该忽视的课题…………… (133)
- 4.2 个人经济行为的理论假定…………… (138)
- 4.3 改革时期个人经济行为的变化…………… (142)
- 4.4 新体制下的个人经济行为机制…………… (151)
- 4.5 个人经济行为动力与行为导向…………… (155)
- 4.6 个人收入分配与行为导向…………… (162)
- 4.7 人的全面发展…………… (169)

5.

三大主体行为机制耦合与秩序创新

- 5.1 经济秩序：经济主体的行为结果与行为条件… (179)
- 5.2 有秩序的市场经济…………… (184)
- 5.3 三大主体行为目标的耦合…………… (193)
- 5.4 三大主体行为约束机制…………… (196)

主要参考文献…………… (207)

1.

经济主体与经济运行

经济主体与经济运行是现代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本章将从新的角度，考察经济主体的内涵与外延，以及经济主体与经济运行的相互关系。

1.1

有关行为主体：一个永恒的话题

1.1—1 从古典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学

对于什么是经济学，古今中外的经济学家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果我们从这样一个角度定义经济学的基本内涵，至少有一部分人会同意我们的看法：经济学是研究经济行为主体利用稀缺性资源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产品的学问。事实上，无论是古典经济学还是现代经济学，无论是中国的经济思想还是外国的经济思想，关于经济主体的行为动机、行为目标、行为方式、行为后果（包括经济主体自身的收益及对全社会经济运行的影响），历来都是作为核心问题加以论述的，各种理论的区别，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对经济行为主体进行分析，或者着重从经济主体行为机制的不同环节进行分析。

产生于17世纪中叶、完成于19世纪初的古典经济学，虽然研究问题没有现代经济学那么细致，但却研究了经济学的各项基本内容。在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一书中，亚当·斯密划分了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的三大主要和基本的阶级，即工人阶级、资本家阶级和地主阶级。他主要从政府和个人两个方面对经济主体进行了分析。首

先，就政府这一主体来说，斯密主要论述了政府作为“守夜人”的职能：即保证资本家阶级有一个发展生产、积累财富的安全环境。换句话说，斯密规定了政府行为的目标。斯密还由此论述了政府行为的两大基本行为手段，即收入和支出，提出了著名的四大赋税原则，即公平、确实、便利和经济。就个人这一主体而言，斯密分别分析了工人、资本家、地主三个阶级的行为特征。其中，对资本家阶级的分析包含了对企业行为特征的分析。这一点不难理解，因为在当时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公共工程和公共事业数量很少，企业多为资本家私人所有，并且，由于工业革命尚未完成，社会化大生产尚未普及，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是统一的，与当代资本主义企业两权分离的情况截然不同。在斯密的理论中，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是体现人类利己主义本性的个人，即“经济人”。这就是著名的“经济人”假说。斯密把社会上的一切经济现象都看成是“经济人”活动的结果，并且认为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并不存在矛盾，二者是一致的。“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每个人“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①

由此可见，古典经济学已经对经济主体的行为机制进行了分析，虽然他们的分析还不细致，还不全面。

① 亚当·斯密：《国富论》下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5、27页。

与古典经济学相比，现代经济学学派林立，色彩纷呈。虽然各学派之间多有论战，但是他们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并不完全对立，可以把众多的学派划分为马克思主义、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三大理论体系。^①在由瓦尔拉斯开创的新古典主义体系中，经济主体，尤其是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机制的某些方面得到了极为细致的分析。实际上，新古典主义的一切理论都是建立在个人主义的个别行为主体的分析基础之上的。他们把经济行为的主体划分为个人和厂商两大类：个人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要素（劳动、资本、土地）的所有者；厂商即生产单位。这些行为主体在一系列既定的环境条件下追求最大化的各自的特殊利益。这里的“环境条件”主要包括：（1）个人的效用偏好结构；（2）现有资源总量；（3）私有制财富分配关系（包括利润索取权和个人禀赋）；（4）技术和技术进步速率；（5）经济信息（包括现状认识和预期）；（6）货币存量；（7）人口增长率；（8）市场机制假定。在这些环境条件下，个人作为要素所有者追求经济收入最大化，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消费选择；厂商则选择生产和组织技术，最大化利润。每个个别当事人的选择和行为的结果，都或多或少地体现在市场价格中，通过作为市场机制核心的价格机制对他人产生影响；当所有个别当事人都在一定条件约束下普遍地实现利益最大化目标时，也就相应决定了全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并决定出一系列经济变量的均衡值，从而构成一般均衡的经济运行过程。

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对经济行为主体的分析也较为细致。在凯恩斯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一书中，他是通过分析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特征，来说明政府这个宏观主体的行为特征的。与新古典主义强调资本主义市场的内在稳定性不同，凯恩斯主义通过强调预期的不确定性和主观概率的不

^① 最早把现代经济学归纳为马克思主义、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三大理论体系的是樊纲，参见樊纲《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

可知性，着重论述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内在的不稳定性。边际消费倾向下降的趋势、工人名义工资的拒下刚性、流动性偏好的陷阱、投资需求的低利率弹性以及价格粘性和真实货币效应缺乏，所有这些情况都说明市场机制本身并不能使国民经济永远保持充分就业基础上的均衡。微观经济主体的这种行为后果，要求政府从根本上拓宽其行为目标，从根本上强化其行为手段的有效性，也就是主要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市场进行干预，刺激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对经济行为主体的分析有独特的视角。马克思根据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将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行为主体划分为两个基本的利益集团，即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并认为这两个阶级的利益矛盾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利益矛盾，这一矛盾的状态和发展变化，决定着整个经济的运行效率和发展趋势。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着重分析的是资本主义经济中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这两个“宏观个体”的行为后果，以此说明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为我们全面分析现代社会经济运行中三大行为主体的行为机制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启示。

1.1—2 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行为主体

政府、企业和个人这现代经济运行中的三大行为主体，不仅是经济理论和思想中一个永恒的话题，而且是当代各国经济管理体制变革实践中的一个普遍话题。这突出表现在：各国政府根据不同时期经济形势的变化，不断改变经济政策和管理体制，达到完善经济主体的行为机制，促进经济稳定发展的目的。

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共同之处在于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及市场关系是社会经济过程中最基本的联系方式。当代资本主义各国政府完善经济主体行为机制的方式和途径虽然不可能超越这一特点的内在规定，却也显示出各个国家的独特之处。这主要表现为各国政府的行为目标尤其是行为方式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最终表

现为经济主体的不同行为后果——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同效率和趋势。

美国在 30 年代以前，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政府的目标局限在国防、社会安定等狭小的范围内，以为市场机制能够有效地引导个人与企业行为，自然地实现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经济的稳定增长。本世纪 30 年代西方世界“大危机”的产生，说明这种主要依靠个人和企业行为实现资源配置、完成经济运行过程的“模式”，并不一定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相一致。现实的困难，促使美国政府从罗斯福总统开始，逐步拓宽政府行为的目标体系，增加行为手段的种类和“硬度”。事实上，当今世界各国政府行为通行的“魔鬼四角”目标——稳定物价、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就是从那时开始出现的；也正是从那时起，更为有效的行为手段——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以及“目的性”更强的货币政策和收入政策——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政府的“锦囊”中。这种变化，到凯恩斯的《通论》问世，政府的这种行为方式有了“理论依据”之后，在 50 年代和 60 年代达到了“峰巅”。进入 70 年代，在政府扩展了的目标体系中真正出现了“魔鬼”——“滞胀”无可置疑地出现了。于是，美国政府改弦更张，变化行为手段，重新认定微观经济主体行为均衡对于赶走“魔鬼”的重要性。当然，从现实中美国三大经济主体的行为协调机制来看，他们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回到“斯密时代”。

德国统一前的联邦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独特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规划和确定政府、企业、个人的行为边界与行为机制。在政府行为方面，德国提出了著名的“球场裁判”和“交通警察”的范式。政府的目标体系是物价稳定、经济增长、社会公正和社会安全；政府的行为手段包括法律手段（主要是卡特尔法）、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政策。原联邦德国在重视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特别强调社会公正和社会安全的重要性，以此为微观经济主体创造平等竞争、宽松和谐的外部环境。

在他们看来，这样一个环境不仅是个人与企业行为机制得以完善的重要条件，而且是连接政府行为与企业行为的纽带；通过这一纽带的协调作用，达到社会和经济目标有机地统一。

工党和保守党在英国政府的轮流执政，使政府行为目标成为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施政”的目标不同，政策也就不同。工党上台，实行“国有化”；保守党执政，则反其道而行之，推行“私有化”。结果，不仅政府行为机制经常发生变化，而且极易导致企业和个人行为机制的不稳定。经济变量的决定，经济运行的效率，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南朝鲜、台湾、新加坡、香港）经济主体的行为机制有着相似的特征。以发挥主导作用的政府行为机制来说，他们都把经济增长作为政府目标体系中最重要的一個；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都把出口的增长作为重要的目标；都以产业政策统筹和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人才政策和技术政策，并且以很强的力度参与经济变量的决定。显而易见，政府行为的这些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个人和企业的行为。例如，日本政府有效地引导微观经济主体发展了不同时期的主导产业。

如果说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大致”规定了各经济主体的行为机制，即使发生变化，也不会“出大格”，那么，社会主义的诞生只有几十年的时间，对于各经济主体的行为机制有什么样的规定性，一直处于探索之中。既然是“探索”，变化的“幅度”就可能很大。所以，经济主体这个“话题”，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有着更为深刻的意义。

我国的社会主义刚刚走过 40 多年的历程。直到 1978 年，政府的行为机制决定一切，企业和个人的行为机制在经济变量的决定中的作用微乎其微。具有真正意义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将“话题”的“议论”中心从政府这一主体内部（即各级政府之间）转移到政府与企业以及政府与个人开始的；改革开放的历史

性贡献，也在于通过完善三大主体的行为机制，使企业和个人这两大主体在经济变量的决定中实际发挥了作用。当然，行为机制的完善仅仅是初步的，有待于进一步开拓和深化。这正是本书的宗旨所在。

事实上，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有些国家早在50年代就“讨论”经济主体行为机制的根本性改造了。南斯拉夫率先标新立异：缩小政府行为目标的范围，减少政府行为手段的种类和力度，踏上了“自治经济”之路。近几年来，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将市场机制引入企业和个人的行为约束条件以及各经济主体的连接机制之中。但是，它们的改革大多已超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范围，在改革遭受种种挫折之后相继走向资本主义经济道路。^①显然，社会主义国家为讨论经济主体这个“话题”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今天，当我们确认改革已为我国广大人民所普遍接受，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时，讨论这个“话题”不是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吗？

1.1—3 一个永远不会完结的话题

一个话题是“永恒”的，意味着任何研究这个话题的结果都不可能穷尽关于这个话题的真理，意味着这个话题是永远也不可能说得透的，就像爱情是文学永恒的话题一样。从古典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学，涉及行为主体的研究成果浩如烟海，但各种理论都有其片面性和不足之处。古典经济学自不必说，斯密、李嘉图所处的时代客观上规定了他们不可能全面地研究现代经济运行中的三大主体；他们所论证的结论也大多只适合于当时的情况。现代经济学中的新古典主义理论，虽然较为细致地研究了微观主体的行为机制，但也只是研究了其中的某些方面。比如，被他们作为“环境条件”的那些因素，是“外在”于理论体系的，他们并不

^① 原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失败甚至国家解体，有着国际国内复杂的背景和政治、经济、历史的深刻根源。探讨这一问题已超出了本书的范围。

考察这些“环境条件”是怎样产生和演化的，也不考察各个“环境条件”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然而，现实中，无论什么样的环境条件，都既是各经济主体行为的条件，又是各经济主体行为的结果，它们都应在同一理论体系中得到说明。当然，新古典主义理论的另一个明显的缺陷是基本上没有展开讨论政府的行为机制。凯恩斯主义理论较多地讨论了政府的行为机制，认识到了信息、预期等因素在经济主体行为过程中的作用，但却没有看到，经济主体之间的市场关系不仅是经济主体行为的条件而且也是经济主体行为的结果，因而认为政府只要刺激需求可即，无需调整经济主体之间的市场经济关系，这当然是片面的。马克思主义对经济主体的研究是着重考察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主体相互间历史地发生的社会关系及其发展演变的原因与规律，告诉工人阶级这一“宏观个体”怎样斗争、怎样争取利益的最大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部研究阶级利益、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学说，而不是从个别主体出发研究主体的经济行为机制的学说。但在现实中，经济主体的行为不仅是解释“阶级”利益函数的变量，而且是解释自身利益函数的变量，并且后者更直观，更“绝对”。

关于经济主体这一“话题”的这种从“反面”理解的“永恒”性，也十分明显地表现在当今世界各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实践中：没有哪一个国家能肯定自己找到了永恒不变的经济主体行为机制的模式。在资本主义世界，不仅各国之间有着不同的经济政策及其背景，不仅每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政策与背景，而且在当代各国内部，也是争论迭起，分歧长存。比如美国凯恩斯学派与货币学派、供应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的争论，再如英国保守党与工党的“自我表现”，还如日本在野党与执政党的相互“攻击”，等等。在社会主义国家，目前仍然处于“转轨时期”的我国自不必说，就是已经“转向”的原苏联及东欧各国，也没有找到适合经济发展的绝对“满意”的三大经济主体的行为机制。所

以说，关于经济主体这个话题，还需要“永恒”地谈下去。

1.2

三大主体：经济运行机制的“能动装置”

“行为主体”这个话题之所以是永恒的，最根本的就在于一个社会的行为主体乃是该社会经济运行机制的“能动装置”，而经济运行机制则是决定一个经济中“效率”与“秩序”的最主要的因素。正因如此，本书选择“经济运行”作为主要的视角，分析不同主体的行为机制。

经济运行机制是一定经济制度下行为主体的经济利益和资源配置的实现方式。它有两方面的内在规定性：一方面，它是显示社会需要偏好，使供给和需求相互适应，实现资源最佳配置的商品生产活动机制，——显然，供给是由企业这一主体创造的，而需求则来自所有的经济主体，资源配置只不过是显示供求互相适应的结果和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它又是各个经济主体追求和实现各自的经济利益，使社会的各种利益矛盾不断获得解决又不断获得发展的利益实现和协调机制，——同样明显的是，社会的各种利益矛盾就是各经济主体之间的矛盾。经济运行机制的二重规定性导源于经济活动的二重规定性和行为主体在经济活动过程中的二重规定性，因此，为了清楚地展示经济主体在现代经济运行机制中“能动装置”的地位，有必要首先分析现代经济活动的特点和行为主体的一般特征。

1.2—1 现代经济活动的特点

经济活动，是人类有目的的获取物质资料的活动。不管人类采取什么样的活动方式——个人单独行动、企业或其他组织形式——经济活动的内在规定性是一样的：一方面，任何经济活动都表现为人类利用可支配的资源，生产出尽可能大的使用价值或效

用，以满足人们的需要；另一方面，任何经济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的，这种社会关系是指所有制关系，以及以所有制关系为基础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相互交换其活动成果的方式等。现代经济活动的特点不在于其内在规定性的“重数”发生了什么变化，即经济活动的二重规定性是永恒的，而在于这二重规定性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具有了更为深刻的经济内容。

现代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专业化分工与协作不断深化，社会生产的“组织性”更强，或者说组织的严密程度更高。这不仅意味着经济主体在进行经济活动时可能遇到的自然物质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不但不会降低，反而有所提高，比如生产规模决策的不确定性就随着生产过程的拉长而有所增强；而且意味着，因为生产过程拉长了，经济活动决策的不确定性增强了，经济主体对社会经济（再生产过程）稳定性的“制动作用”更为明显。

现代经济活动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行为主体、行为方式更为多样，利益关系更为复杂。新制度经济学的先驱科斯教授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用“交易费用”概念论证了企业存在和纵向一体化（非专业化）的原因：企业的存在是为了节约市场交易费用，即用费用较低的企业内部交易替代费用较高的市场交易；企业规模被决定在企业内部交易的边际费用等于市场交易的边际费用的那一点上；相继生产阶段或相继产业之间是订立长期合同，还是实行纵向一体化，取决于两种形式的交易费用孰高孰低。科斯教授还在另一篇论文《社会成本问题》中，进一步用交易费用概念论证了政府存在（实际上是作为“交通警察”和“球场裁判”政府）的原因。现代经济活动的特点，当然不在于企业和政府的出现，而是在于物质生产领域内企业数量的大幅度增加和政府规模的扩大，而且还在于非直接生产领域内企业种类和数量的大量增加，如发达的商业企业、各种形式的银行或非银行金融企业